

朱、陆分歧与徽州学者“和会朱、陆” 历程

解光宇

中文提要：朱熹和陆九渊学术思想分歧由来已久。“和会朱、陆”是宋明学术史上的重头戏。在“和会朱、陆”历程中，徽州学者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朱升认为，朱、陆所分别主张的“道问学”与“尊德性”的关系是动、静关系，“动而道问学，静而尊德性”，二者是相辅相成，“如寒、暑、昼、夜之更迭而无间”，缺一不可；郑玉认为，朱、陆之学各有优劣，应取长补短；赵汭认为，朱、陆思想“合并于暮岁”；程敏政提出“早异晚同”说。徽州学者的这些观点直接影响了王阳明及其后学。

关键词：朱熹，陆九渊，徽州学者，“和会朱、陆”，理论贡献

徽州文化以其特有的文化遗存而著称于世，如古民居、古祠堂、古牌坊、古桥等。正是由于这些文化遗存，才引起对徽州文化的关注。徽州文化的研究涉及许多领域，如徽州商帮、徽州宗族、新安理学（徽州古称新安）、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州文书、徽派朴学、徽州科技、徽州建筑、徽州民俗等。尽管徽州文化涉及领域众多，但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和”。如徽州民居的建筑注重“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徽商注重“和协”、“以仁心为质”、“和气生财”；徽州宗族注重“敦厚亲族，和睦乡邻”，等等，不一而足。在这里重点谈谈徽州学者在学术领域里的“和”，尤其是在“和会朱、陆”问题上作出的贡献。

一、朱、陆思想的分歧

在宋明理学中，有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分。同生活在南宋的朱熹和陆九渊分别是这两派的领军人物之一。朱熹和陆九渊学术思想分歧由来已久。南宋著名学者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和陆九渊之间学术思想的分歧，于 1175 年 6 月，邀请朱熹、陆九渊及其兄九龄（复斋）会于江西信州鹅湖寺（在今江西铅山县），这就是著名的“鹅湖之会”。这次相会，朱、陆围绕关于治学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朱、陆同宗孔、孟，但因入德为学之方各异，故在一系列问题上必然看法不同。朱、陆之争是理学内部两大派的分歧和争辩，对后世儒学发展影响甚大。从一定意义上讲，只有以朱、陆之争为背景，才能充分显示宋明新儒学内两大派别的实质内容及各自的理论个性。

朱、陆之间的重大争论有这样几次：一是关于无极、太极之争；二是对人物评价的争执，主要是对朱、陆共同的弟子曹立之的评价和对王安石的评价而引起的争辩。最为重要的争辩是在鹅湖之会上双方关于为学方法之争。

淳熙二年（1175）6月5日，在信州（今江西铅山）鹅湖寺举行了一次规模不大、但影响深远的哲学讨论会。会议由吕祖谦主持。参加会议辩论的主要是朱熹和陆九渊、陆九龄，还有朱、陆、吕的门人以及有关学者约二十余人。会议主要是围绕认识理的方法而进行论争。朱熹主张先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简约，二陆则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博览群书。朱熹责二陆教人过简，二陆责朱熹教人过于支离。会议召集人吕祖谦本意是调和朱熹和陆九渊即南宋理学阵营内部的“理学”和“心学”之间在方法论上的分歧，使之哲学观点“会归于一”，但事与愿违，双方各不相让，争论三日，不合而散，不仅没使双方哲学观点“会归于一”，反而更明确了“理学”与“心学”的分歧。

那么，朱、陆思想的根本分歧何在？

朱、陆所谓“意见不合”，集中体现在心与理的关系上。在心与理的关系上，朱熹虽有“心即理”的思想，但“性即理”是他的基本命题。他认为心外之理是最高本体，因此是理一元论者。而陆九渊认为，天地万物之理都在我心中，心与理是完全合一的，故是心一元论者。陆九渊说：“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①所谓心与理“不容有二”，就是针对朱熹的“心外有理”而言：他认为，理具于心。心就是理，不必离心去讲什么理。他说：“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②“人心至灵，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③可见，陆九渊反对朱熹的“心外有理”，是心一元论者。

对于陆九渊的“心即理”思想，朱熹既有肯定，又有批评。肯定陆九渊讲良知良能四端，“且成片举似经语，不可谓不是”，并且他本人也有这类思想。同时又批评说：“圣贤之教，无内外本末上下。今子静却要理会内，不管外面，却

① 《陆九渊集》卷一，《与曾宅之》。

② 《陆九渊集》卷十一，《与李宰》。

③ 《陆九渊集》卷二十二，《杂说》。

无此理。”^①可见朱、陆之间，并不仅是心与理是否合一的矛盾，而且还有心外是否有理、心外是否有物的矛盾。

朱熹不仅认为心外有理，而且认为心外有物。陆九渊则反对心外有物，进而提出“吾心即宇宙”的思想。他说：“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是宇宙内事。”^②宇宙如何便是吾心呢？他说：“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③这就是说，只有经过我的心，才能知道有万物；没有我的心，就无法知道有万物。因此，万物就在心中。吾心豁然，就能充塞宇宙。可见这是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

由于朱、陆哲学在本体论上的差异，因而导致方法论上的差异。黄宗羲说：“先生（陆九渊）之学以尊德性为宗，谓‘先立乎其大者而后天之所以与我者不为小者所夺。夫苟本体不明而徒致功于外索，是无源之水也’。同时紫阳（朱熹）之学则以道问学为主，谓‘格物穷理乃吾人入圣之阶梯。夫苟信心自是而惟从事于覃思，是师心自用也’。”^④陆九渊强调以尊德性发明本心，即“先立乎其大”为宗旨，提倡易简工夫。朱熹强调尊德性与道问学，涵养本心与格物穷理同时并进，但更强调格物穷理。朱熹以读书为穷理的主要方法，但根本目的仍然是明德性。陆九渊主张“先立根本”，根本既立，则“六经皆我注脚”。^⑤故批评朱熹格物穷理的方法为“支离”破碎。

朱熹认为，不能只强调内面而忘了外面，必须内外功夫并用而不可偏废。内外本是一理，但由于人气禀之私，物欲之蔽，不能明得心中天理，故一面要存心，一面要穷理；一面要做心地功夫，一面要向外格物。二者齐头并进，用力久

① 《朱子语类》卷一二四。

② 《陆九渊集》卷二十二，《杂说》。

③ 《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

④ 《宋元学案》卷五十八。

⑤ 《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

了，必然豁然贯通，“则亦有以知其浑然一致而果无内外精粗之可言矣。”因此，内心功夫固不可缺，但穷理之学决不可无。如果没有外面功夫，内心功夫也无从做，吾心之明德也不能明。如果不管外面，“外面更有过言过行更不管，却云吾正其心，有此理否？”^①他批评陆九渊说：“陆子静说良知良能，四端根心，只是他弄这物事，其他有合理会者，渠理会不得，却禁人理会。鹅湖之会，渠作诗云‘易简工夫终久大’，彼所谓‘易简’者，易简容易尔，全看得不仔细……易简有几多事在，岂容易简之云乎！”^②“今必以是为浅近支离而欲藏形匿影，别为一种幽深恍惚艰难阻绝之论，务使学者莽然措其心于文字语言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后可以得之，则是近世佛学诚淫邪遁之尤者。”^③即以陆学为禅学，只讲顿悟而不讲渐修，只讲理性的飞跃而不讲感性认识的积累。

所以朱熹既重视尊德性又重视道问学，认为二者不可偏废。如果只有尊德性而无道问学，则功夫缺了一半，那一半也决不成学问。因为二者“始终本末循循有序，精粗巨细无有或遗。”要尊德性，就必须道问学。虽然需要各自加功，但又不是“判然两事”。“故君子之学，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须道问学以尽其小”。“学者于此固当以尊德性为主，然于道问学亦不可不尽其力。要当使之有以交相滋益，互相发明，则自然该贯通达而于道体之全，无欠阙处矣。”^④

陆九渊针对朱熹的批评提出了激烈的反批评：“朱元晦曾作书与学者云，陆子静专以尊德性诲人，故游其门者多践履之士，然于道问学处欠了。某教人岂不是道问学处多了些子，故游某之门者践履多不及之。观此则是元晦欲去两短合两长。然吾以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⑤他认为朱熹的“去两短，合两长”也不行。只有存吾心守吾德性，才是根本。根本不立，一切无从谈

① 《朱子语类》卷一二〇。

② 《朱子语类》卷十六。

③ 《大学或问》卷二。

④ 《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玉山讲义》。

⑤ 《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

起。此乃是他的“易简”工夫。

朱熹认为，每一物有一理，“格物是零碎说”，都要格，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最后才能豁然贯通。并且批评陆九渊穷理只穷一个理是“只寻个一，不知去哪里讨头处”。陆九渊也讲格物致知、格物穷理，但他的格物穷理是立足于“心即理”之处。他不承认有所谓事事物物之理，且反对朱熹向外去穷理。理只有一个，此外别无理。穷理就是穷这一个理。他认为“理只在眼前，只是被人自蔽了”，因此，穷理就是“不专论事论末，专就心上说。”^①

从朱、陆的异同可看出，二者对理的认识是一致的，即如黄宗羲所云：“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但对于理的存在形式，二者产生了分歧。朱熹认为理是客观存在，陆九渊认为理存在于心，心即理；朱熹认为，由于理是客观存在的，必须通过格物才能致知，先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简约，即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才能产生飞跃；陆九渊认为，由于理存在于心，必须发明本心，才能先立其大，才能心如明镜。即提倡“顿悟”。

“朱、陆异同”问题的争论是宋明学术史上重要内容，“鹅湖之会”拉开了这场纷争，使两派日益对立，“宗朱者诋陆为狂禅，宗陆者以朱为俗学，两家之学，各成门户，几如冰炭。”^②“鹅湖之会”既标志着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地位的确立，同时也为“和会朱陆”拉开了帷幕，并开启了“和会朱、陆”的先河。正如黄宗羲云：“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见不合，亦不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谓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原无有背与圣人。矧夫晚年又志同道合乎！”^③正是由于朱、陆“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为“和会朱、陆”奠定了基础，因而，“和会朱、陆”成为宋明理学发展史上的必然。

① 《陆九渊集》卷三十五，《语录》。

② 《宋元学案》卷五十八，《象山学案》。

③ 《宋元学案》卷五十八，《象山学案》。

二、徽州学者“和会朱、陆”历程

在“和会朱、陆”的历程中，徽州学者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虽然有少数学者如程瞳认为朱、陆之学“早异晚异”，互不相容，但大部分学者都主张“和会朱、陆”。朱升认为，朱、陆所分别主张的“道问学”与“尊德性”的关系是动、静关系，“动而道问学，静而尊德性”，二者是相辅相成，“如寒、暑、昼、夜之更迭而无间”，缺一不可；郑玉认为，朱、陆之学各有优劣，应取长补短；赵汭认为，朱、陆思想“合并于暮岁”；程敏政提出“早异晚同”说。徽州学者的这些观点直接影响了王阳明及其后学。

朱升（1299—1370），字允升，号枫林，徽州休宁回溪人，后迁居歙县石门。朱升十七岁师从陈栎，陈栎师事朱子三传弟子黄智孙，朱升则为朱子五传弟子。作为朱熹五传弟子的新安理学家朱升，不仅是明朝的开国功臣，同时在学术上也有独特的建树。政治上，朱升从战略高度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创基立国之策；学术上，作诸经旁注，凸现儒学真谛，返归元典儒学，求真足之归。尤其是提出理是“脉理、纹理”，摒弃程朱理学和陆九渊心学关于理的神秘性和主观性，赋予理以客观规律性，更是对先哲思想的超越。

关于朱、陆学术同异问题，朱升也作了辩证分析。就“道问学”与“尊德性”之间的关系，朱升认为：“《大学》以修己治人为纲要，以致知力行为工程，然而知止能得之间，必有事焉。《经》所谓定静安，《论语》所谓仁能守之，《孟子》所谓居安资深者是也。《中庸》曰：‘尊德性而道问学’，盖致知力行二者，皆道问学之事。动而道问学，静而尊德性，二者功夫如寒、暑、昼、夜之更迭而无间。尊德性即《大学》之正心也。《大学》诚意，是省察克治于将应物之际，正心是操存涵养于未应物之时，与既应物之后。然八目于致知之后，即继以诚意而正心，但列于其后者，盖《大学》为入德者言，使之先于动处用

动，禁其动之妄，然后可以全其静之真也。此圣贤之心法、为传学之本也。”^①

可见，朱升将“道问学”与“尊德性”的关系，看成是动、静关系，“动而道问学，静而尊德性”，二者是相辅相成，“如寒、暑、昼、夜之更迭而无间”，缺一不可。但在这里朱升更强调“尊德性”。如“正心”、“诚意”、属“尊德性”范畴，“诚意”是“省察克治于将应物之际”，正心是“操存涵养于应物之时，与既应物之后。”即“正心”、“诚意”贯穿于“格物、致知”的始终，“尊德性”贯穿于“道问学”的始终。从朱升对“道问学”和“尊德性”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可见其是对朱、陆的超越。朱熹虽然尊德性与道问学并提，但更重视后者；陆九渊着重尊德性而轻视道问学。而朱升认为二者“如寒、暑、昼、夜之更迭而无间”，相互贯通，互为其根，相辅相成，将二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可见其思想的辩证性。这种辩证地和会朱、陆，为新安理学“和会朱、陆”开了先河。如郑玉认为朱陆之学各有优劣，应取长补短；赵沅认为朱、陆思想“合并于暮岁”；程敏政提出朱、陆思想“早异晚同”等，都是和朱升思想一脉相承的。

郑玉（1298—1358年），字子美，徽州歙县人。郑玉青少年时代在家乡从先生学儒家四书五经。稍后，随父至淳安，师侍陆学名儒吴墩。同时，他还与夏溥、洪震老等陆学学者极为道合。可见，郑玉实为陆学弟子。

郑玉虽为陆学传人，但对朱学也有较深的造诣，因而对朱、陆之学利弊以及共性分析得比较透彻。郑玉认为朱、陆之学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及其至也，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岂有不同者哉！况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尊周孔，同排佛老，同以天理为公，同以人欲为私，大本达道，无有不同者乎！”^②郑玉认为朱、陆之学各有利弊：“朱子之说教人为学之常也；陆子之说高才独得之妙也。二家之学亦各不能无弊焉。陆氏之学，其流弊也，如释子之谈空说妙，至于鹵莽灭裂，而不能尽致知之功。朱氏之学，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寻行数墨，至于颓惰

^① 《朱枫林集》卷3，跋大学旁注后。

^② 《师山先生文集》卷三，《送葛子熙之武昌学录序》。

委靡而无以收力行之效”。^①即是说朱子的“道问学”是为学之常规，但其弊在于支离与迂腐，以至“颓惰委靡”脱离实践而无“力行之效”。陆子的“尊德性”确实有独到高明之处，但是易流入空谈，主观武断，严重脱离实际，更无“致知之功。”

郑玉上述“和会朱、陆”思想在和会朱、陆史上是有一定位置的。全祖望曾说：“继草庐（吴澄）而和会朱、陆者，郑师山也。草庐多右陆，而师山则右朱。”^②全祖望之意有二，一是说在吴澄之后和会朱、陆影响比较大的为郑玉；二是说郑玉虽本于陆学，但更侧重朱子学。郑玉侧重朱子学，主要认为朱子学是儒学的“集大成”者，功同孔、孟：

“至吾新安朱夫子集诸儒之大成，论道理，则必著之文章；作文章，则必本于道理。”^③

“至吾新安朱子，尽取群贤之书，析其异同，归之至当，言无不契，道无不合，号集大成，功与孔、孟同科矣。”^④

虽然郑玉“右朱”，但对学者们的门户之见深为不满：“后之学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异……此岂善学圣贤者哉！”^⑤“是学者自当学朱子之学，然亦不必谤象山也。”^⑥即是说学者不应有门户之见，崇拜朱子之学，不应诽谤陆子之学；崇拜陆子之学，也不应诽谤朱子之学。不同学派之间应该和睦相处，取长补短。

赵沍（1319—1370年），字子常，徽州休宁人。《明史》称其“初就外傅，

① 《师山先生文集》卷三，《送葛子熙之武昌学录序》。

② 《宋元学案》卷九十四，《师山学案序》。

③ 《师山先生文集》卷首，《余力稿序》。

④ 《遗文》卷三，《与汪真卿书》。

⑤ 《师山先生文集》卷三，《送葛子熙之武昌学录序》。

⑥ 《师山先生文集》卷三，《与汪真卿书》。

读朱子《四书》，多所疑难，乃尽取朱子书读之。闻九江黄泽有学行，往从之游……后复从临川虞集游，获闻吴澄之学。”吴澄为朱熹的四传门人，赵沅又获吴澄之学，可见赵沅为朱熹再传弟子，朱学传人。

赵沅“和会朱、陆”的思想，主要反映在《对江右六君子策略》中。赵沅认为，朱、陆二先生虽为儒者，但他们在学术上确实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是由他们学术传承上的差异所决定的。朱子之学出于周、程，而周子之学出于颜子。陆子之学则有得于孟氏立心之要，而以孟子为师。颜子与孟子的学术差异，导致朱子与陆子的学术差异，即“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差异。赵沅认为，二先生的这种差异是“入德之门”的差异。至于到了晚年，二先生各自反省自己，均觉察到自己学问之病。朱熹认为，自子思以来，教人之法以尊德性、道问学为用力之要。陆九渊强调尊德性，而自己强调道问学。应当反身用力，不堕于一偏。即朱熹不仅重视道问学，同样重视尊德性，二者相辅相成，不能偏执于一端。陆九渊也对过去“粗心浮气，徒致参辰，岂足酬义”表示反省。赵沅据此认为：“夫以两先生之言如此，岂鹅湖之论至是而各有合邪。使其合并于暮岁，则其微言精义必有契焉。”赵沅关于朱、陆“合并于暮岁”之说，是“和会朱、陆”进程中新的切入点，特别是为明程敏政关于朱、陆“早异晚同”的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郑玉、赵沅之后，明代著名理学家程敏政提出朱、陆“早异晚同”之说，对“和会朱、陆”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并对后继的和会朱、陆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程敏政（1444—1499年），字克勤，号篁墩，徽州休宁县人。程敏政“和会朱、陆”思想比较集中在他的《道一编》中。《道一编》是程敏政收辑朱、陆二家言论和往来之书信。《四库全书总目·道一编六卷》提要说，《道一编》“不著撰人名氏，编朱、陆二家往还之书各为之论断。见其始异而终同。考陈建《学蔀通辨》曰：‘程篁墩著《道一编》，分朱、陆异同为三节，始焉如冰炭之相反，中焉则疑信之相半，终焉若辅车之相依。朱、陆早异晚同之说于是乎成矣。王阳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论》之录，与《道一编》辅车之说正相唱和’云

云，然则此书乃程敏政作也。”道光《徽州府志》亦云：“程太史敏政著《道一编》，以朱、陆之学始异而终同”。

《道一编》卷一、卷二是摘编朱、陆“始焉如冰炭之相反”的有关书信和言论。卷一摘编朱、陆鹅湖之会诗三首。程敏政在卷一开宗说：“此卷凡三诗，盖二先生论所学者其不合，与论无极同。”程敏政认为，鹅湖之会朱、陆“相与讲其所闻皆不合”，朱、陆分歧是明显的：“盖二陆诗有支离之说，疑朱子为训诂；朱子诗有无言之说，疑二陆为禅，会两家门人遂以成隙至，造言以相訾，分朋以求胜，而宗考亭者尤不能平恚其以支离见斥也”。^①

《道一编》卷二收录朱子之说十六条，陆子之说二十条，可具体观照二先生“始焉若冰炭之相反者。”

《道一编》卷三摘录了朱子之说十六条，陆子之说十四条，旨在说明朱、陆“中焉觉疑信之相半”。实际上从所摘录的朱、陆言论来看，还是属于“冰炭之相反”的范畴。

《道一编》卷四收录了朱子之说十五条，陆子之说十条，旨在说明朱、陆晚年“若辅车之相依”。从收录的朱子言论来看，主要是说明朱子晚年接受陆九渊的“尊德性”思想。如第一条便是《朱子答项平父书》：“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说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道问学上多了。……熹自觉义理上不敢乱说，却于紧要为己为人上多不得力，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几不随一边耳。”程敏政在这段话后加按语云：“此书则知朱子所以集诸儒之大成者。如此世之偏心自用、务强辩以下人者，于是可以惕然而惧、幡然而省矣。然陆子亦有书论‘为学有讲明、有践履’，全与朱子合。”^②朱熹认为，子思以来的教人之法是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结合，二者不可偏废。朱熹反省自己，认为在“道问学”上下功夫，但在“尊德性”上不得力，应当两个方面都要重视，去两短，集两长。因此程敏政认为朱子

① 《道一编》卷一。

② 《道一编》卷二。

学术胸怀宽广，能接受和容纳不同的观点，不愧为集诸儒之大成者。那么陆子是如何论“为学有讲明有践履”的呢？

为了说明陆子“全与朱子合”，程敏政收录了《陆子与赵咏道书》：“为学有讲明、有践履。大学致知格物，中庸博学审问，谨思明辩。孟子始条理者智之事，此讲明也。大学修身正心，中庸笃行之，孟子终条理者，圣之事，此践履也。”陆九渊注意到过去只强调“尊德性”，而忽视“道问学”，这也是不全面的。因为《大学》既讲致知格物，也讲修身正心；《中庸》既讲博学审问、谨思明辩，也讲笃行。培养人的目标是又智又圣，所以在教育方法上既要“讲明”义理，格物致知，又要道德“践履”、修身正心。这样，朱子和陆子都反省自己治学的短处，吸收对方的长处，由早期的“异”转向晚年的“同”。程敏政认为，由于朱子认识到“尊德性”的重要性，朱子对陆学有了改变。程敏政引录了《朱子答陈庸仲书》来说明之：“陆学固有似禅处，然鄙意近觉婺州朋友专事闻见，而于自己身心全无工夫，所以每劝学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静，方于义理知所决择。”在这段后程敏政加按语云：“朱子书在前两卷者曰‘子静全是禅学’，至此始谓‘陆学固有似禅处’，且劝学者‘要得身心稍稍端静，方于义理知所决择’，即是观之，则道问学固必以尊德性为本，而陆学之非禅也明矣。”^①

在《朱子与吕子约书》后，程敏政也加了按语。《朱子与吕子约书》云：“孟子言学问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里。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体都奔在册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个无知觉不识痛痒之人，虽读得书亦何益于吾事邪！”朱子在这里强调求其放心的重要性，并反思过去只是埋头于书册，忽视正心诚意。若忽视修身正心，即使书读得再多，也是个无知觉不识痛痒之人，小到不知有己，成为迂腐之人；大到不关心国家大事和民族前途。程敏政在《朱子与吕子约书》后加按语云：“此正陆子之学平日淳复以教人者也”。

^② 并引录《陆子论学问求放心》之言论：“古人之求放心，不啻如饥之于食，渴

① 《道一编》卷四。

② 《道一编》卷四。

之于饮，焦之待救，溺之待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孟子斯言谁为听之不藐者。”通过朱、陆二先生关于对“放心”论述的比较，程敏政认为二先生的观点已趋于一致。

程敏政认为，朱、陆“两先生之说不能不异于早年而卒同于晚岁，学者独未之有考焉。”^①程敏政编著《道一编》的目的就是证明朱、陆“早异晚同”。朱子早年曾激烈地批评陆学，维护“道问学”。到了晚年，朱子“深悔痛艾于支离”，并“七见于书札之间”。程敏政所选朱子七封书信是：《朱子答陆子书》、《朱子答吕子约书》三封、《朱子答何叔京书》、《朱子答吴伯丰书》、《朱子与周叔谨书》。在《朱子答陆子书》后，程敏政按云：“朱子此书谓‘迩来日用功夫颇觉有力，无复向来支离之病’，盖‘支离’二字始见于此。……考象山与子渊书有云‘所谈益高而无补于实行者’正朱子之意。……以二书味之，朱子既自以支离为病，陆子亦复以过高为忧，则二先生胥会必无异同可知。”^②

程敏政认为，朱子到晚年反思自己的“道问学”，认为陆子批评的“支离”的确是“病”；陆子也作了反省，认为自己的“尊德性”所谈甚高，无补于实行。二先生都作了自我批评，同时肯定对方的长处，故程敏政说“二先生胥会必无异同可知。”

至此可见，程敏政和会朱、陆是有一定逻辑程序的，即是以朱子为论述的主体，把朱子认识陆学作为一个过程而逐步展开的。朱子先是指斥陆学“全是禅学”到“固有似禅处”，然后从“求放心”到反思自己的治学方法有“支离之病”，最后肯定陆学的意义。同时引述陆子有关言论，说明陆子对过去轻视“道问学”以及“粗心浮气徒致参辰”、“所谈甚高而无补于实行”作了深刻的反思。去早年朱、陆之异，合晚年朱、陆之同，最终完成了和会朱、陆的任务。

程敏政“和会朱、陆”的“早异晚同”说，影响了王阳明以及后来的许多学者，如周汝登、孙奇逢、黄宗羲等人。王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无疑受到程敏

^① 《道一编》目录后记。

^② 《道一编》卷四。

政的影响：“近年篁墩诸公尝有《道一》等编，见者先怀党同伐异之念，故卒不能入反激其怒。今但取朱子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辞，虽有偏心，将无所施其怒矣。”^① 故陈建曰：“王阳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论》之录，与《道一编》辅车之说正相唱和。”

上述的徽州学者主张“和会朱、陆”，以折衷的方式来协调儒学内部的矛盾，以保证儒学的统一性，体现出较多的理性因素。同时可见，“和”是徽州文化的重要特征。在一定范围和限度内的学术争论和批评是必要的，但这不是目的。学术的最终目的是用“和会”的方式取长补短、综合创新，这样才能创造出更加灿烂的儒家文化。

（作者系中国 安徽大学 儒学研究中心教授）

投稿日：2008.9.9，审查日：2008.12.15-31，刊载决定日：2009.1.2

参考文献

- 朱 熹，《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陆九渊，《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
朱 升，《朱枫林集》，合肥：黄山书社，1992。
郑 玉，《师山先生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程敏政，《道一编》，《四库全书存目》本。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① 《王阳明全集》卷四，《与安之》。

Zhu Xi and Lu Jiuyuan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and Huizhou Scholars the History of “Zhu Xi and Lu Jiuyuan Peace Conference”

Xie Guangyu

Zhu Xi and Lu Jiuyuan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of academic exist for a long time. “Zhu Xi and Lu Jiuyuan Peace Conference” is the main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Song and Ming academic. The history of “Zhu Xi and Lu Jiuyuan Peace Conference”, Huizhou scholars have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Zhu Sheng, Zhu and Lu advocated by the “Avenue school” and “moral respec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ic and dynamic relationship, “moving is to ask, quiet is respect for morality”, the two are mutually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such as “the replacement of the cold, the Department, Day, Night” are indispensable. Zheng Yu believed that Zhu Xi and Lu Jiuyuan pros and cons of each school should complement each other. Zhao Fang has the view that the thinking of Zhu and Lu “in old age merger together”. Cheng Minzheng “different in early and same in late”. The point of view of Huizhou scholars had a direct impact on Wang Yang-ming afterward scholar.

Key Words: Zhu Xi , Lu Jiuyuan, The Point of View of Huizhou Scholars, “Zhu Xi and Lu Jiuyuan Peace Conference”,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